

从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 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动员

何孔蛟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立煌为核心,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为动员民众抗战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工作。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中心内容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统制日益加强。新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的过程,折射出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新桂系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党治的不断加强。

[关键词] 抗战; 新桂系; 大别山敌后根据地; 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3-0077-05

抗战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基于民族大义,纷纷请缨出战。新桂系首领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广西进行军事动员后,派遣军队奔赴前线抗战。淞沪会战后,新桂系军队一部退往豫鄂皖边界的大别山中,建立了以皖西立煌为核心,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的大别山根据地。大别山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南京、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大别山在形势上已位居敌后。为发动民众抗战,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

一 从民众动员委员会到宣传委员会:宣传组织的演变

宣传工作是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至关重要。1938年1月26日,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新桂系控制了安徽的军政大权。但为制衡新桂系势力,以方治、邵华等为首的国民党CC系控制着安徽省党部,安徽出现党政“分治”的现象。1938年6月,安徽战时省会迁往大别山腹地的立煌。但1938年8月,省党部却由立煌迁往屯溪,直到1939年3月复由屯溪迁回立煌,与省政府长达七个月分隔两地。新桂系无法通过党部发动民众抗战,只得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联合安徽进步势力,通过行政力量主导宣传动员工作。1938年3月5日,李宗仁在六安成

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派遣指导员到各县指导动员工作,成立工作团赴各县开展动员工作^{[1]2-3}。为将动员工作涵盖整个大别山区,省动员委员会向鄂东、豫南各县也分别派遣了工作团。

武汉会战后,国民党鉴于大别山地区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地位,以新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为骨干,以皖西立煌为核心,建立大别山敌后根据地。1938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要求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设立游击根据地,向皖北、豫东方面挺进游击^[2]”。为广泛动员民众,以大别山为依托,建立敌后根据地,新桂系进一步健全动员委员会机构,各区、乡镇也成立动员委员会,形成了严密的宣传动员体系。各级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行政负责人担任,省一级由省主席担任,县一级由县长担任。同时规定,“民众动员工作成绩,列为县长考成主要项目”^{[1]49}。动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必胜理论,以提高人民抗战之情绪,宣传日军残暴行为,以增加人民对敌之愤恨”^{[1]55}。

随着大别山根据地的日益巩固,CC系逐渐被排除出权力中心,新桂系控制了安徽的党权,于是将宣传动员工作纳入党部工作范畴,调整改组省动员委员会,撤回了派往各地的工作团,最终撤销了各级动员委员会。将动委会指导组织成立的青年、妇女、农民、工人以及文化界等各种抗敌协会划归省党部、县

[收稿日期] 2018-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研究”资助(编号:16BZS075)

[作者简介] 何孔蛟(1977-),男,安徽池州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党部领导。1940年,新桂系开始建立宣传联系机构,在省一级设置省宣传委员会,指导、谋划和推动全省宣传工作,在县一级,则以党部为中心,联系军政及教育动员机关,组织县宣传委员会,作为各县宣传工作的设计机构,并划分全县为若干宣传区,区设区队1队,下辖宣传分队3至6队,以乡村为主要宣传区域。1944年,在省党部积极督导下,各县成立宣传委员会59个,宣传区队124队,分队452队,深入各地从事各种宣传活动^{[3]11}。宣传工作的主导力量由动员委员会演变为宣传委员会,由行政力量主导演变为党务力量主导。

二 宣传方式的多样化

宣传方式是实现宣传目标的手段。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必须确定不同的宣传方式。为增强宣传工作的效果,新桂系采取集会宣传、报刊宣传、艺术宣传和散发传单等多种宣传方式。

(一)集会宣传

集会宣传主要是利用纪念日或纪念周举行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每逢国民党重大纪念日或纪念周,省会立煌都要召集各界人士举行大规模的集会,省政府主席发表训话,宣传战争形势和政策措施,增强抗战情绪,坚定抗战信心。1938年,省动员委员会先后举行五个扩大宣传周:民众总动员宣传周、肃清汉奸宣传周、防空宣传周、雪耻和兵役宣传周、兵役宣传周。“各种告民众书印了57000份,标语印了25000份。”^{[1]156}1939年,省动员委员会先后举行了十个扩大宣传周,包括元旦宣传周、春耕运动宣传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周、健全基层行政宣传周、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五月各革命纪念日宣传周、“七七”抗战两周年宣传周、“八一三”与“九一八”宣传周、双十节宣传周^{[1]285}。省党部在每次纪念周时,“一面策动省会各界,依照纪念办法举行纪念,一面编发宣传纲要或要点”^{[3]12},充实集会内容,增强宣传效果。动员委员会还通过在公共场合举行讲座开展民众宣传,“在许多乡村的茶社里,本来是说书先生的位置,现在已改成时事讲座和抗战讲座了”^{[1]163}。在霍邱的工作团,凡是在城镇集市繁华场所,团员们就排起整齐的队形,唱起抗战歌曲,把群众集聚起来进行演讲;痛斥日寇侵略野心和罪行,诉说沦陷区群众的悲惨遭遇;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4]55}。

(二)报刊宣传

安庆失陷以后,原先省会的报纸几乎全部停刊,硕果仅存的只有皖报。1938年5月,皖报由六安移

至立煌,由于条件限制,版面和印数大为缩减^{[5]30}。各县的小型报纸,也大多停顿下来。新桂系高度重视报刊宣传,1939年1月,成立安徽省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负责指导各地报刊工作,在经济上予以补贴。当时,省会立煌最重要的报纸除了皖报外,还有大别山日报。大别山日报内容丰富,每日刊载通讯一篇,并辟专栏刊载有价值的文章,于1939年5月16日发刊,1940年1月29日停刊后合并于皖报。虽然时间短,但发行量最高时达到3800份。据1939年底调查,安徽国统区出版的报刊有70余种^{[5]32}。除了极少数的月报外,其余的报刊大多是1939年间创办。1940年,仅省会立煌出版的刊物就达24种^{[5]34-35}。1939至1940年间,安徽国统区的报刊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1944年,纯属于地方性之报纸竟有63种之多^{[3]12}。各种报刊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抗战法规法令,介绍国际国内和大别山抗战形势,动员广大民众抗战。

(三)艺术宣传

艺术宣传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包括戏剧、歌咏、绘画、标语等方式。省动员委员会每个工作团都能演几曲戏,每个工作团本身就是一个歌咏队,不仅熟悉各地通行的剧本和歌曲,而且根据工作经验和宣传内容创造新的剧本。“民间歌曲《莲花落》《凤阳花鼓》《孟姜女》《十杯酒》《送郎歌》等都换上了新的抗战内容,有几县并且对那些歌曲花鼓的卖艺者办训练班。”^{[1]163}一些民间小调、鼓词填进新的抗战内容,新的歌曲亦应客观需要创作起来。1939年冬,省党部组织团结剧团,次年成立工作队六队,派赴各党务督导区,进行戏剧宣传,并辅助各县及中等以上学校组织戏剧歌咏队。1942年底,各县共成立“戏歌队82队、剧团14个”,1943年,“组织宣传大队1队,巡回各县实施戏剧宣传”^{[3]12}。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大别山地区访问时发现:“谴责汪精卫和其他卖国贼的标语和彩色招贴画在四面八方的墙上大声疾呼”,到处可见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优待抗日将士家属;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则;拥护全民教育,扫除文盲”^[6]。

省动员委员会还成立少年宣传团,以戏剧、歌咏的形式进行抗战宣传,1939年曾出发皖北一带作长期流动宣传^{[1]288}。少年宣传团的演员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岁^{[7]246}。省动委会还成立绘画标语队,赴各地流动开展工作,在通衢大道制作经久醒目的标语。在大别山内外的道路两旁,装饰起六幅壁画和基本标语^{[1]163}。1943年,为加强并扩大艺术宣传影响,组织立煌美术界人士成立美术协会,

绘制大批巨形铁质油画暨历史连环画,鉴立街头及巡回各县宣传^{[3]13}。

(四)散发宣传品

散发宣传品主要是面向广大民众发放各种传单、画册和报刊等。1938年,省动委会宣传部由军委会政治部领来2万多张漫画,1万多张瓦解敌军的宣传品,2千余册的剧本及各种宣传材料,悉数发放,并印发了4千份的告战地民众书和慰劳前方将士书^{[1]158}。1939年,省动委会印发宣传资料第一期1000本、印发漫画集三种9000本、印发国民公约漫画2000本、印发抗战各项漫画6.5万张、印发抗战小型传单12万份、印发日文对敌宣传标语16万份、准发中宣部及政治部各项宣传品14万份、印发剧本及歌曲50种4.3万份、印发各纪念日宣言4.2万份^{[1]286}。

新桂系在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增强了民众的抗战意识,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加深了民众对敌仇恨的决心,克服了民众恐日病的心理”^{[1]245}。“凡动员工作人员足迹所到的县份和乡村,一般抗战的情绪都提高了”“国家民族的意识逐渐成长起来”^{[1]164}。1938年,省动员委员会在六安举行的动员工作扩大宣传周,参加人数达万人,一时使大别山敌后抗日群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潮流。特别是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宣传动员工作,“开辟了大别山区八年抗战中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4]153}。由于安徽宣传动员工作成效显著,国民党中央曾“三次传令嘉奖”^{[1]244}。

三 宣传中心的转变和宣传传统的加强

抗战时期,新桂系的宣传工作始终服从于抗战环境和自身统治的需要,服务于各阶段的中心工作。随着新桂系在大别山根据地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转变,宣传工作的中心也相应改变。

(一)从宣传配合军事到宣传配合行政

1938年1月,新桂系主政安徽时,抗战形势严峻,安徽大部份县沦陷,军事发展由皖中、皖北而及于大别山周围。“徐州、合肥相继失守,皖中皖北均告吃紧,津浦、淮南、安合、六合等路,悉被敌人打通”,大别山地区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1]488}。因此,宣传工作的中心是配合军事作战,主要任务是宣传三民主义,加强民众精神动员,激发民众爱国热忱;宣传国际国内局势演变,坚定民众抗战信心;推进抗战文化教育,灌输民众抗战知识。省动员委员会派遣宣传队分赴各县工作,促进民众精神动员;指导刊印各种宣传品,并成立各种宣传组织;出版抗敌

救亡刊物,扩大民众动员宣传^{[1]20}。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因防线过长,“大别山周围以及皖中、皖北的敌军都先后撤退”^{[1]158}。日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军事进攻逐渐减弱。新桂系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投入大别山根据地建设。宣传工作的中心也由抗战变为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配合军事作战的同时,突出省政府各项政令的宣传,推动政令实施。1939年1月,新桂系颁布了《安徽战时施政纲领》。为了防止敌货侵入以及货源资敌,巩固法币,减轻民众负担与征收合理税收,充实抗战力量,安徽省政府号召推行“完纳正当赋税、巩固法币、铲除奸商”三项运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侧重于《安徽战时施政纲领》和三项运动的宣传^{[1]284}。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后,大别山根据地已相对巩固,新桂系在实行抗日宣传的同时,更加注重政令宣传。1940年,新桂系修订《安徽战时施政纲领》,颁布《县(区)政令宣传实施办法》,规定以兵役、粮政、公共造产、管价、国家总动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焚烟禁赌、新县制、户政、农田水利、储政、学生及公务员从军、国民义务劳动等16项为本年度政令宣传中心工作,并随时指示工作要点及推进方式^{[3]12}。

(二)从宣传团结抗战到宣传抗日反共

大别山地区曾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所在地。抗战爆发后,鉴于大别山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开辟大别山区工作的指示,派遣地下党员到六安组建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霍丘县委、立煌县委、六安临时县委、舒城县委、霍山支部、岳西支部”^[8]。新桂系主政安徽前期,因抗战形势严峻和自身立足未稳,需要借助中共力量巩固自身统治,于是与中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级动员委员会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成为国共两党在安徽以党外合作的组织形式开展战时动员的领导机构^{[4]149}。安徽省财政厅曾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军费^{[7]41}。1938年12月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和第四支队政委戴季英到立煌,就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防区等问题与新桂系谈判并达成协议。1939年5月和7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先后偕罗炳辉、张云逸两次前往立煌谈判,达成设立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协议,并由省财政厅拨付拖欠的新四军军饷^{[9]276}。此时宣传工作的内容侧重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新桂系虽然与国民党中央仍然存在矛

盾,但随着中共力量在安徽的发展,新桂系感到自身统治受到威胁,认为日寇是“有形的”,尚属易防,而中共是“无形的”,难以防范,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工作对工作”^[10]。于是新桂系在大别山根据地的施政方针开始发生改变,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靠拢,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与中共的关系日益恶化。1939年11月15日,国民党安徽、河南、湖北三省党部在立煌集会,制定《鄂豫皖三省党部防遏共党活动办法》^[11]。1939年12月,新桂系在安徽国统区掀起清壁运动,将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标语、墙报、壁画等全部铲除干净^{[9]287}。新桂系的宣传方针由抗日宣传到抗日与反共宣传并重。1940年,省会各界发起“抗敌锄奸宣传周”,甚至妇女会都“组织了宣传队,至城郊各处宣传”^[12]。省党部要求各地以“抗敌锄奸宣传”为中心,定期报送宣传报告,同时向各县分党部分发《新四军罪恶的检讨》《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团结与分裂》等反共宣传材料^[13]。

(三)从发动民众宣传到统制宣传

新桂系主政安徽前期,借重于动员委员会开展宣传工作,而各级动员委员会成员中很多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相对宽松,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涵盖各个层面,体现宣传工作的群众化。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广为流传,连国民党党部人员和桂系官兵都争相传阅《论持久战》,新桂系曾无可奈何地喟叹:“持久战,人人看。”^{[4]215}动员委员会各工作团和宣传队成员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宣传中共全面抗战的思想,如国民党规定的标语有“拥护蒋总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统一军令政令”等,工作团就改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实行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全面抗战”^{[9]177}。

1940年以后,新桂系排挤了国民党CC系势力,控制了安徽党务大权。为利用组织力量加强自身统治,开始大力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大量征求国民党党员。1939年,安徽国统区仅有区分部573个^{[14]21}。1941年,区分部增加到1521个^[15]。1939年,国民党党员人数仅16148人^{[14]23}。1940年开始大量征求,仅1至8月就征求新党员45795人^[16]。随着基层组织的健全和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大,新桂系在安徽国统区的党治日益强化。省党部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统制,认为“当兹抗战期间,新闻传播不特国人重视,而且举世殷瞩,记载一有不当,最易混乱是非,淆惑听闻,影响抗建大业”,于是对各种新

闻报纸和刊物实行统制,采取的措施包括:“(1)严督各出版机关,限期申请登记,如有违背,勒令停刊。(2)出版物原稿应先交由当地主管机关或党部审查。(3)各种出版物,应尽先分送本署及本区党务指导机关审核。(4)如有违背党义国策,影响抗建大业之荒谬言论,即予勒令停刊,并依法惩处主办人。”^{[17]28}经过安徽省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函令各刊物报纸杂志等出版社“尽量征集刊载关于三民主义之研究与阐扬之文字”,甚至规定各地杂志等刊物“每期必载阐扬或研究三民主义之论著一篇”,各地报纸社论“阐扬或研究三民主义者,应占篇幅全数四分之一,或每周刊载关于阐扬或研究三民主义之论著最少一篇”^[18]。

1940年,省党部组织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戏剧审查委员会,加强对图书和戏剧的审查。制定出台了《安徽省会戏剧审查办法》,仅1940年就禁演平剧20余种^[19]。1941年岳西、庐江、巢县、宿县、颍上、太湖、广德、蒙城、舒城、六安、定远、涡阳、亳县、凤台等县也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3]14}。鉴于各地宣传标语混乱的局面,新桂系认为“既失宣传效用,且有碍观瞻”,于是1940年实行清壁运动,“凡城乡纸质或木质铁质标语,不问其旨意正确与否,均予一律廓清”,另由省党部根据抗战建国政策和当时客观环境,制定统一标语24条。1941年国共摩擦加剧后,“增加统一肃清奸匪宣传标语4条,并从省会附近要道,用巨型木质制成固定统一标语,再飭各县利用石灰红土普遍缮制,以广宣传”^{[3]12-13}。

抗战时期,新桂系以大别山为依托,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建立敌后根据地。新桂系在大别山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的演变过程,无论在宣传组织、宣传方式、宣传内容等方面都先后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反映了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内在变化,也反映了新桂系在大别山根据地的统治日益巩固和党治的不断加强。通过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增强了民众的抗战意识,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有效动员了民众抗战,大别山敌后根据地“政令能迅速畅行了,军政民打成一片了”“征兵不用麻绳绑了,老百姓乐意来抽签,志愿兵也有了”^{[1]330}。大别山根据地成为国民党“中原唯一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271}。抗战时期,与大别山环境相同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还包括中条山、苏北、鲁南等根据地,然而“中条山、苏北、鲁南相继沦陷之后,而大别山尤能巍然独存”^[20]。这与新桂系的广泛宣传动员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 [1] 安徽省档案馆. 安徽省动委会档案资料选编[A].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 [2] 蒋纬国. 抗日御侮:第3卷[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114.
- [3] 安徽省政府秘书处. 安徽概览:党务[Z]. 1944.
- [4] 六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六安抗战史料汇编[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 [5] 安徽省政府秘书处. 抗建中之安徽:戊编文化[Z]. 立煌:安徽省政府秘书处,1940.
- [6]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中国的战歌[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303.
- [7] 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 [8] 彭康. 关于安徽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等致秦邦宪同志信[M]//彭康纪念文集.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117.
- [9] 六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安徽省动委会简史[M]. 六安:中共六安市党史研究会,2003.
- [10] 各县书记长应有之共同警策[J]. 安徽党务,1940(19).
- [11] 李松林.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307.
- [12] 最近省会妇女工作的轮廓画[J]. 安徽党务,1940(6).
- [13] 各科工作周报[J]. 安徽党务,1940(3).
- [14] 安徽省政府秘书处. 安徽省民国二十八年年度统计年鉴[Z]. 1939.
- [15] 本会工作检讨会记录[J]. 安徽党务,1941(32).
- [16] 安徽党务设施之回顾与前瞻[J]. 安徽党务,1940(18).
- [17] 安徽省第七区工作报告:民政[R]. 1940.
- [18] 宣传科工作周报[J]. 安徽党务,1940(6).
- [19] 各科工作报告[J]. 安徽党务,1940(11).
- [20] 李品仙. 八年来大别山抗战的回忆[Z]//安徽省政府秘书处. 八年来之安徽,1946:1.

Th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in Dabie Mountains Base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Kong-j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e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ew Guangxi clique ruled Anhui and established the enemy rear base area of Dabie Mountain, with Lihuang County in the west of Anhui as the core and Anhui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 as the main body. In order to mobilize the masses to resist the war and consolidate their own rule, the New Guangxi clique carried out various forms of propaganda work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nvironmen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entral content of propaganda work had changed obviously, and the control of propaganda work had been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Th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New Guangxi clique in the base area behind the enemy in Dabie Mountains had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administrative domination to integration into Party governance, reflecting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Guangxi clique and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reflect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New Guangxi clique and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Party governance.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ew Guangxi clique; the base area behind the enemy in Dabie Mountains; propaganda